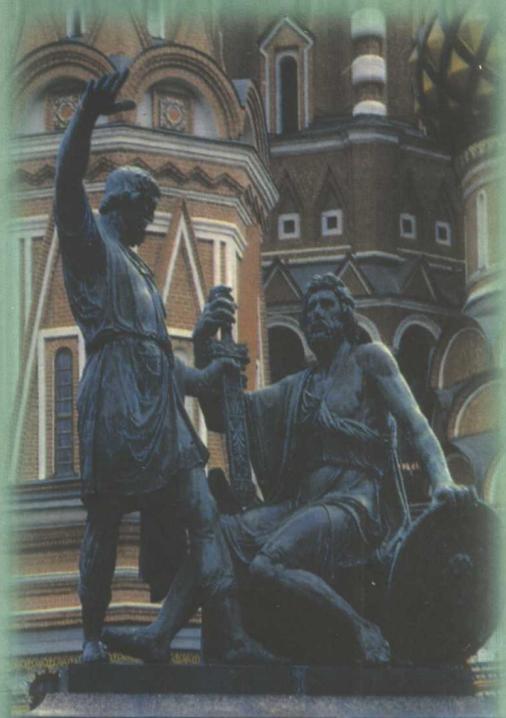


# 俄罗斯文化史

大 学 参 考 用 书

[俄] M·P·泽齐娜 Л·В·科什曼 В·С·舒利金 著

刘文飞 苏 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俄罗斯 文化史

大 学 参 考 用 书

[俄] M·P·泽齐娜 J·B·科什曼 B·C·舒利金 著

刘文飞 苏 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 Р. Зезина Л. В. Коиман В. С. Шудыгин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осква 1990

根据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本中译本的出版得到作者的授权

### 俄罗斯文化史

M · P · 泽齐娜

[俄]Л · В · 科什曼 著

B · C · 舒利金

刘文飞 苏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25,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2250-3/K · 069

定价：19.20 元

## 译序

两年前一个冬日的傍晚，在莫斯科别里亚耶沃地铁站附近的一家书店中，我们发现了这本《俄罗斯文化史》。几乎是在翻阅、购买此书的当儿，我们即已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的念头。今天，厚厚的一摞译稿已叠放在我们的案头。在数月的翻译劳动接近尾声时，我们在对这部文化史著作又一次的回味。

与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相比较，俄罗斯文明的开端要迟得多，但从基辅罗斯的建立（公元9世纪）至今，俄罗斯文化也已经历了长达10多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在这千余年中，俄罗斯文化在各个领域都程度不一地对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成为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个魁伟身影。对千年文化史作一概括、集中的追溯，是这部《俄罗斯文化史》的主旨。

本书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分解为中世纪、近代、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这样几个大的时间段。

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系指9—17世纪的俄罗斯文化。这是俄罗斯文化史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发展阶段。在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文化由口头诗歌、“桦皮文字”、编年史、“拜占庭风格”的宗教建筑和绘画等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文化，经过蒙古统治时期的文化衰落，再到统一的俄罗斯文化伴随着统一的俄罗斯民族、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在15至17世纪间的确立，走过了一条时起时伏、忽明忽暗的路程。在这一时期，“罗斯受洗”、蒙古入侵、“混乱时期”是对文化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公元988年，罗斯正式将希腊正教奉为国教，使俄罗斯民族加入了基督教世界，促进了

F14P 6118

罗斯内部的统一和对外的交往。同时,东正教会的建立,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舞台上添加了一个新主角,由此,教会和政权、宗教与世俗、信仰与自由的矛盾便出现了,且一直贯穿了中世纪俄罗斯的文化进程。13—15世纪,蒙古人在东部欧洲建立了统治,这对俄罗斯文化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使它中止了与西欧基督教列国的文化并进,而不重文化积累的蒙古鞑靼人的游牧天性和统治方式,又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多少东方文明的养料,故导致了俄罗斯文化的停滞。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是一段权势相争不休、民众起义不断的“乱世”,其起因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爆发,其结果则是民族、国家和文化统一进程的加速。

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的文化,构成了俄罗斯的近代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文化民主化的发展、理性主义在文化各领域中的体现和资本主义关系对文化的初步渗透。这一进程的开端,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彼得为振兴俄国而决意全盘“欧化”,其中也包括文化的“欧化”。他限制了教会的权力,为文化的世俗化创造了前提;他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甚至规定不读书者不得成婚,从而增强了全社会的文化意识和理性精神;他造船、建都、征战、办厂,为俄罗斯奠定了一个较为丰厚的物质文化基础。19世纪上半期,激荡社会的两件大事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胜利,唤起了俄罗斯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似乎从那时起,俄罗斯同时作为一个军事巨人和文化巨人屹立在欧亚大陆上。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作为一场贵族的、知识分子的革命,自然会在文化中留下深刻的反响。

19世纪下半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期,是俄罗斯文化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俄罗斯社会完成了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涌现出了一大批天才人物,并同时向世界文化宝库奉献出了大量杰出的科学发

现、思想巨著和文艺精品。农奴制度在 1861 年的废除，将俄罗斯文化连同俄国农民、俄国社会一起解放了出来；作为社会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最终形成，开始在文化中扮演主要角色；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在人类文艺创作史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使俄国的影响遍及半个地球、长达半个多世纪。

苏维埃时代的文化，大体等同于 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化。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时期，文化以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面向人民的民主化和追求社会平等，追求个性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为其风格和实质。这一时期文化的思想倾向相对统一，但文化的起伏也很多、很剧烈。从文化“更新”的 20—30 年代到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从战争的胜利到战后的“个人崇拜”，从“解冻”到“冷战”，从“停滞”到“改革”，每一时刻的文化无不留有社会巨变刻下的烙印。

有人说，俄罗斯民族一直面临着两个大的矛盾：一是东、西方的矛盾，即地理上的文化碰撞；一是上、下层的矛盾，即社会构成上的文化差异。俄罗斯地处欧亚之间，地理位置决定它的文化有一定的兼容性。它早期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后虽接受了基督教，但离西方世界还是有距离的，东正教会中一直有一股势力，欲将基督教的中心东移至莫斯科，因而有视莫斯科为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的说法。彼得改革，一下子把俄国推到了欧洲。之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峙一直是俄国思想斗争的焦点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后，东、西欧之间出现了一堵柏林墙；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出现了“回归欧洲”的呼声。无论就文化传统、还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俄罗斯都是欧洲的东方、亚洲的西方，俄罗斯文化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来回于世界文化的两极之间。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持续很久的国家，封建统治的长期持续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席卷欧洲的启蒙之风未能吹醒俄罗斯。但是，俄罗斯

又拥有一个与欧洲任何一国相比都毫不逊色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发达的上层和相对愚昧的下层之间的差异，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造成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原因之一。这一东一西、一上一下的两对矛盾，像是俄罗斯民族、也是俄罗斯文化的十字架，它是俄罗斯命运之路的路标，也是俄罗斯文化整体特性的一个表征。

“文化”这个词，据说是世界上拥有定义最多的一个概念。定义宽泛则指人类的一切行为及其结果，接近于“文明”；窄小则指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社会门类，接近于“文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人有别于动物的创造力的物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可以表征一定的历史时代和文明水准。以人为本，文化就是人的精神生活；以社会为本，文化即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综合体。视角不同，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也就不同，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文化巨大的涵盖性。本书作者没有对文化作出特别的定义，但对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作了区分，并主张“在文化的所有领域的统一和相互关系中把握文化”（《绪论》）。这便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即对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本书作者对“文化”的理解似乎处于“宽”与“窄”之间，他们既没有将文化史等同于一般的通史，同时又扩大研究范围，将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民俗史、文艺史等诸多内容统一了起来。通览全书，便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俄罗斯文化史的十分开阔的印象。而在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某些文化分支，又往往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比如，我们熟悉俄罗斯文学，但如今我们在俄罗斯文化的全图中重温文学史，便会自然地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的、历史的，甚至是科学的因素联系起来，从而有可能对某些文学课题（如俄罗斯文学的起源与编年史，教会对文学的促进和阻碍作用，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主题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作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农奴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生，等等）作出新的思索。

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其客观性。史书当以客观为准则，但做到绝对公允亦不易。与俄罗斯学者的其他一些论著相比，本书是较为客观的。纵览全书，感到“干货”很多，水份较少，没有多少可有可无的议论或节外生枝的插笔。连续不断的史实和事件记录、人物和思想介绍等，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学术个性的展现，但却为读者以后自己作出独特的评断创造了前提。这首先是因为，欲在含中文 30 余万字的篇幅中完成一个大民族千余年的文化通史，作者不得不设法最有效地去利用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再者，本书的三位作者（M·P·泽齐娜、П·В·科什曼、B·C·舒利金）均为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此书是他们在反复教授多次的教材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本书所带有的教科书的性质，也使它要尽量客观，好在未来的文化研究者面前树起学术威信，并留下科研余地。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写作于“改革”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得以摆脱思想禁锢，从治史工作中卸下沉重的政治诠释任务。

本书由原苏联高校出版社出版于 1990 年，但今天看来，该书尚无过时之嫌。上述的两个特点，保证了这本文化史相对持久的学术价值。另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出现了，国际上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必将会更集中、更细致一些，在此背景下，作为俄罗斯单一民族之文化通史的这本《俄罗斯文化史》，反倒显得更为适时了。

俄罗斯的书面文化就起源于编年史，但对文化史的自觉研究则直到 19 世纪末才展开。当时的文化史，大致等同于文明史，如 П·Н·米留可夫的《俄罗斯文化简史》（1898—1899 年）和 М·Н·波克罗夫斯基的《俄罗斯文化史纲》（1915 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史的研究为思想史、社会史、文艺史等的研究所取代了。直到本世纪 60 年代，对俄罗斯文化史的兴趣才又高涨起来，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断代史和资料集。但是，在本书出现之前，尚无一种新的《俄罗斯文化史》面世。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这一场持

续很久的文化研究热的集大成者。在我国，几年前也出现了对文化和文化史的热衷。这一有先后却很相似的现象，值得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这里，我们仅希望以《俄罗斯文化史》的翻译，为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借鉴。

文化史的翻译，因涉及到各个学科而显得艰难。由于我们学识有限，译文中一定有许多错误，希望本书的读者能赐我们以指教。

刘文飞 苏 玲

## 绪 论

文化是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在当代社会学中，有许多时而是不尽相同的文化定义。但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文化”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总是包含着教育——智力教育和道德教育（В·И·达里<sup>①</sup>）。一个不具有文化—历史观的社会生活范畴，是很难找到的。

在“文化”这一概念中，人及其活动构成一个综合的基础，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人的创造，就是人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但是，在文化中，人不仅是一个能动的生物，而且是一个自我变化着的生物。在创造客观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同时，人也在创造他自身。“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sup>②</sup>

与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范畴相呼应，也存在两个文化概念——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然而，当今的许多文化史研究者和社会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去淡化两种文化间的界限。在研究文化时，确实无法在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这两个范畴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因为这两者彼此是紧密联系的。物质生产领域中人类活动的成果，即所谓物质文化的产物，不可能离开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参与而出现。它们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的知识和智能的客观体现，也就是说，其中包含着精神成分。精神文化的产品，同样也有其物质体现（书籍、绘画作品、电影及音像制品等）。因此，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同时涉及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一个

共同的基础，即列宁所称的“物质基础”<sup>③</sup>。

在一系列的历史学科中，文化史的对象有其特征和内涵。文化史首先是以对其不同范畴的综合研究为前提的，这些不同范畴包括：科学技术史，生活方式，教育和社会思想，民俗学和文艺学，艺术史，等等。对于这些学科而言，文化史是一门包容性的学科，它以一套完整的体系，在文化的所有领域的统一和相互关系中把握文化。

对文化各分支的研究，是研究整个文化—历史过程的最重要的素材。

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在考察人的活动的科技、思想道德、艺术范畴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并展示出文化史的社会层面，弄清并展示出人民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一进程中的活动。在注意到文化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时，还必须理解某一特定历史时代各种文化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些现象与社会—经济过程之关系的特殊性。各种社会意识方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社会意识的发展、文化价值的传播体系在不同阶段的社会之中的产生与扩展进程的本身，以及文化价值传递给后代的方式，——这些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都是饶有兴趣的。

在研究人类社会漫长历史道路中的文化时，存在着一个如何把那些体现历史—文化进程之实质的各种标准加以汇总的问题。作为这一进程之非常重要的体现者的，不仅有由社会所创造出的文化价值，而且有文化价值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传播的途径、方式和可能性，还包括在利用这些文化价值时内容、特征和目的上的变异（如教育的体系和方式、知识水平、读者的社会构成等）。

---

① 达里(1801—1872年)：俄国作家，词书编纂家，民族学家。——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译者

③ 参阅《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译者

就整体而言，文化进步具有矛盾性，这尤其是阶级对抗的社会所固有的。文化的不同范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某些范畴中的成就可能伴随着另一些范畴中的停滞或倒退。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在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其中包括文化领域中，少数人的发展，是通过对多数人的这种可能性的限制来完成的。马克思曾针对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写道：“……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sup>①</sup> 这必然要导致社会的文化分化的加强。表现在文化中的人的精神活动的相对独立性，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结果。

阶级对抗社会中的文化，其思想内容基本上取决于统治阶级。<sup>②</sup> 文化的阶级性体现在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倾向性上，体现在对相关阶级之利益的服务上。这一点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

然而，阶级社会的文化并不能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它总包含有被压迫阶级的文化，或哪怕是这一文化的某种成分。<sup>③</sup> 但尽管如此，阶级社会的文化并不分解为社会各阶级的文化，使它得以统一的，是“时代的统治思想”和作为文化传统最重要来源的民间文化。这两种文化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

必须防止一种简单化的评价，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反动的文化，而民间文化则全是进步的。必须指出，这一或那一阶级时而会成为文化向前发展的代表，时而也会成为其障碍。最后，不应忘记，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外，还有客观上的全人类的内涵，其中就包括艺术财富。这种内涵使文化遗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25 页。——译者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1—52 页。——译者

③ 参阅《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0—241、243 页。——译者

产成了未来时代文化的财富。

文化遗产是体现社会历史发展承续性的最重要的形式。即便是在彻底否定旧社会许多社会—历史法规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要创造本质上全新的文化，也离不开对文化遗产创造性的把握，离不开对过去时代文化的谨慎态度，离不开对不同文化领域中所创造出的那些财富的保护。今天，我们尤为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创造社会主义文化而利用过去的遗产，——这是列宁的文化发展观和文化革命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sup>①</sup>列宁在 1920 年全俄第三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强调指出，“学好共产主义”的这一任务中也包括，必须“……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sup>②</sup>以丰富自己的头脑。

全面发展的个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以及文化的道德—伦理价值具有不小的作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定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③</sup>，应当被确立为文化进步的特征和朝向。大众对文化的把握，个性的全面发展，每一个体向社会进步之自觉主体的转变，——应同时成为向前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在改革的条件下，当民主化的方针被确立后，我们的社会得以更为广泛地接触过去的文化遗产。这无疑将使得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在研究俄罗斯文化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其他国家和民

---

① 《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 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9、301 页。——译者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91 页。——译者

族的文化在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俄罗斯文化和这些文化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问题。必须避免两种极端的、同样是错误的态度。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在俄国、在当代西方的史学界都有),它认为,在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外来影响起着首要的作用,整个俄罗斯文化就是这些影响的结果,这些影响要么来自拜占庭,要么来自西欧。另一种观点则与忽视了俄罗斯文化和其他文化间相互关系的意义有关,认为俄罗斯文化仿佛是自我发展的,与世界的历史—文化进程毫不相干。

对于每一种文化来说,那种会导致停滞的民族封闭性,以及那种对构成文化之内在基础、保持文化之稳定的民族传统的忽视,都是同样有害的。在每一种文化、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中,与其他文化积极的相互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俄罗斯文化的状况首先仍取决于内在的进程,而非外来的影晌。

文化史是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整体而言,文化史的发展也遵从社会史的规律,其分期也与社会史的分期大体一致。每一社会—经济结构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类型。然而也必须注意到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因为这种动力会影响到历史—文化进程。社会—文化生活中许多新现象的出现,就是该结构内在发展的重要体现。

在研究文化时,还必须注意到,也可能出现某些受特定时代历史条件制约、却为文化所独具的特殊规律性。在不同的时期,在文化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可能是文化的这一分支,也可能是文化的那一分支(整个中世纪起主要作用的是建筑,19世纪是文学,在当代文化发展中是科学,等等)。

在俄国,对俄罗斯文化史的兴趣大约出现在19世纪30至40年代。这一兴趣的出现,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与对民族往昔的普遍关注有关,也与当时的思想斗争、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命运的争论有关。

“文化”这一概念本身也出现在此时。在 19 世纪上半期，这一概念的相应词常常是“教育”一词。“文化”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由 M·B·彼得拉舍夫斯基<sup>①</sup>于 1845—1846 年间出版的《袖珍俄语外来词词典》(第 1—2 卷；后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中。

在这一时期对历史有着普遍兴趣的背景下，涌现了许多关于民间生活、民间作品、民歌和民间传说等专题的研究著作；对俄罗斯文学、对在俄罗斯文化中起过一定作用的个人和机构之活动的兴趣，也开始出现。<sup>②</sup>

对文化及文化研究问题的兴趣继续发展，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与 20 世纪初一些关于社会思想史和俄国知识分子史的著作的出现有关。Д·Н·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sup>③</sup>在《俄国知识分子史》(莫斯科，1906—1907 年版，第 1—2 卷)一书中，以俄罗斯文学为素材分析了上述问题。在探讨社会心理类型时，他也许是开创性地揭示了文学巨大的社会作用。

Г·В·普列汉诺夫在那本未完成的著作《俄国社会思想史》(彼得格勒，1914—1917 年版，第 1—3 卷)中，试图对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文化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是，作者也未能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研究者们的影响，这些研究者认为，社会思想史就是一个个思想家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这本著作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唯物主义地解释社会思想的发展。该书对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遗产的评论，也具有重大的

---

① 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 年)：俄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

② 参阅：Ф·И·布斯拉耶夫《论祖国语言的教学》，莫斯科，1844 年版；以及他的《俄罗斯民间文艺作品及艺术史概论》，圣彼得堡，1861 年版，第 1—2 卷；И·Е·扎别林《远古以来的俄罗斯生活史》，莫斯科，1876—1879 年版，第 1—2 部；П·И·彼卡尔斯基《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的科学和文学》，圣彼得堡，1862 年版，第 1—2 卷；А·Н·佩平《别林斯基，生平与通信》，圣彼得堡，1873 年版，第 1—2 卷(此为关于别林斯基的第一本专著)。

③ 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1853—1920 年)：俄国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译者

意义。

革命前期,就出现过一些将文化史当作特定的历史学领域来加以研究的著作。在 19 至 20 世纪之交时,资产阶级自由派历史学家 П·Н·米留可夫的《俄罗斯文化简史》(圣彼得堡,1898—1899 年版,第 1—3 部)非常出名,该书体现了其作者对于俄国历史总的看法。米留可夫是一个国家历史学派的拥护者,虽然他自认为是经济唯物主义的追随者。他所理解的“文化史”概念是非常广义的,几乎包括“内在生活的所有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国家方面、宗教方面、美学方面”。米留可夫虽然反对在评价历史现象时的一元论立场,但他仍认为,将“精神因素的发展”、或是将“物质需求的状况”视为历史文化进化的决定因素,都同样是不正确的。П·Н·米留可夫的《简史》是对人口、“经济生活”、国家制度、等级关系、宗教信仰、文学、教育、社会思想等问题的连贯的评述。而且,米留可夫承认“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一观点实际上否定了“西方影响”在俄国文化发展中的优先权。对彼得的改革,他也持否定态度。

1915 年,侨居国外的 М·Н·波克罗夫斯基<sup>①</sup>出版了《俄罗斯文化史纲》,该书提出的关于历史文化进程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与米留可夫的历史发展图示针锋相对的。波克罗夫斯基将主要的注意力投向经济题材,证明了经济发展乃是历史进程、其中包括文化进程的基础。

但是,对俄罗斯文化史的这一唯物主义的阐释,就方法论而言,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善的。波克罗夫斯基没有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提出过什么新的东西。他将整个历史文化进程视为一个被垂直分解的过程,也就是说,他把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分类研究

---

<sup>①</sup> 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 年):前苏联历史学家,1918 年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译者

作为基础。这样一来，文化史就变成了对经济、宗教、文学等文化基本领域的压缩的评述，各领域彼此间被描绘得没有联系，它们与特定的历史时代也没有联系。

列宁的著作对于理解和研究俄国的历史文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列宁的著作中，包含着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评断，给出了革命解放运动阶段性发展的特征，论述了我国教育的状况以及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考察了党性、文化遗产等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列宁确立了许多基本原理、建设新文化的思想以及党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政策原则。苏联史学家对列宁在文化领域的理论遗产的研究很重视。该类研究著作中最近的（就出版时间而言）一种，为 B·B·戈尔布诺夫所撰。<sup>①</sup>

苏维埃文化史在战后被划分为祖国史学科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对苏维埃文化史最为广泛的研究，开始于 60 年代。

以观点的新颖而出众的大部头综合性研究成果，是由 M·П·基姆<sup>②</sup>所主编的集体合作的专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形成（1917—1927 年）》（莫斯科，1985 年）和《改造时期的苏维埃文化（1928—1941 年）》（莫斯科，1988 年）。除了全民教育、科学、艺术文化等传统题材外，这两部专著还探讨了诸如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改变、原先落后的一些民族的精神觉醒和文化的物质基础这样一些问题。

在对祖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分门别类的原则，亦即对文化各分支的研究，由来已久。由于进行了长期、大量的工作，苏联学者取得了许多关于祖国文化各个领域的翔实、严肃的研究成果。一系列百

---

<sup>①</sup> 参阅 B·B·戈尔布诺夫《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前苏维埃时期）》，莫斯科，1980 年版；《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苏维埃时期）》，莫斯科，1985 年版。

<sup>②</sup> M·П·基姆（1908—）：前苏联历史学家。——译者